



1991年1月,云南梅里雪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登山事故,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十七名队员遭遇雪崩,全部遇难。这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。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,梅里雪山也成为人类唯一无法登顶的山峰。事故发生后,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方搜索。搜索队伍中一位名叫小林尚礼的日本登山队员,更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,为了让山难队友们的亡灵回到亲人身边,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,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体。《梅里雪山:寻找十七位友人》,就是小林尚礼多年艰辛搜寻的记录。本书以纪录片式平实而细腻的文字,壮美与温柔兼具的影像,记录了令人心碎的恐怖山难,艰辛的搜寻,梅里雪山的神秘风貌,山脚下人们的朴素生活,三次转山之旅和当地生活的变化。在跨越多年的搜寻中,他从傲慢的外来登山者,逐渐转变成成为神山的守护者,一位自然主题的摄影师和作家。而雪山之残酷与神圣,自然对其心灵和生活的荡涤,也同样荡涤着每一个热爱雪山的灵魂。

梅里雪山的神性

□郭净

我们在为梅里山难三十周年策划一套纪念丛书期间,小林尚礼提出疑问,这件事在日本已经过去,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在意?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有些含糊,没有让他,也让自己满意。然而,一场疫情在2019年底爆发,并延续至今,仿佛老天爷揭晓了答案——

西方现代文明在数百年的狂飙突进中确立了一种逻辑,即把世界划分为有灵性的“人”(human)和无灵性的“自然”(nature),并将这种区别固化在一套金字塔式的分类系统中。发端于15世纪的探险运动,其主旨是“文明”对“荒野”和“原始”的探索和操控;而借壮阔山水来彰显个人的勇气和智慧,亦成为探险运动的核心价值观。

20世纪70到90年代,针对喜马拉雅雪山群的登山和科考行动,逐渐脱离了早期单打独斗的境况,进入到群雄逐鹿的竞争时代。梅里登山是这个潮流中最激进的一波,却在物资充沛、准备周全的情况下遭遇惨败。其受挫的根源,是对大自然威力的低估,而这种威力,不仅表现为突发的雪崩,更以当地神山信仰的形式呈现出来。

梅里登山的挫折,和眼前这场蔓延南瞻部洲的祸患似乎难以相提并论,但它们都借死亡,凸显了被科技和经济繁荣遮蔽了的两个核心问题:人类与自然、文化与文化应该如何相处。

这座被登山者和旅游者称作“梅里”的雪山峰,藏语的意思是“白色的雪”(卡瓦格博)。这个命名包含着深刻的寓意:他不仅具有岩石、森林的自然

形貌,也被赋予了人类敬畏的神性。在上千年的岁月里,当地人仰仗着卡瓦格博的庇护,也因此画定了人与神圣世界不可逾越的边界。所谓“山神”,正是那个拥有庞大力量,能够赐福,也能够毁灭众多小生命的力量象征。然而,放眼我们生息于斯的山河湖海,自认为尊处生物链顶端的人类,无所不在地侵入神圣的森林、冰峰、湿地、海滩,“荡涤”着他们厌恶的物种和景观,同时也必然因生物圈的自我矫正而遭到报复。这冲突的焦点,恰恰是我们面对灾难,总在回避却再也无法回避的诘问:自然是否有神性?人类的探险是否应有限度?

探险家们裹挟在如此剧烈的冲突中,不得不首先承担无法预料的后果。作为一个怀抱理想,却又身陷“莫斯肯大漩涡”的登山者,小林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躲开。当然,他的初衷并不是要去了解神山为何物,其实日本人也相信山神,但在他们的文化里,朝圣者是可以登上山顶,对神灵祈祷的。他原本是去搜寻友人的遗迹,就像《缅甸的竖琴》中的水岛一样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在东南亚收集死难将士的骨骼,让他们的魂灵有个归宿。1999年8月5日,我曾跟着村长大扎西、村民达娃和小林尚礼前往冰川,拍摄他们寻找罹难者遗物的过程。那时,小林对藏族知之甚少,乃至心怀疑虑。等一个月以后我再去大扎西家时,他已经和这家人建立了初步的友谊。十二岁的白玛次木和十一岁的松吉品初用藏语和汉语跟他聊天,大扎西趁着酒兴跟他普及卡瓦格博信仰的基础知识。一种比探险更加久远



《梅里雪山:寻找十七位友人》
[日]小林尚礼 著
乌尼尔 译
乐府文化 |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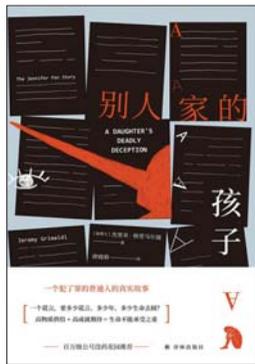
和深厚的传统,像酒精一般点点滴滴地渗进日本客人的身体和脑袋。如同高更和洛克,那个逃避都市,却又受困于山野的叛离之人,慢慢褪去坚硬的盔甲,转变成了一个山岳文化的摄影家和探索者。

这种身份和灵魂转变的例子,在探险史上属于例外。我竟有幸在平凡之路上见证这段传奇,见证一个登山者被雪山改造的故事。这故事或许预言了一种前景:在种种冲突愈加激烈的时刻,哪怕凭借个人的微薄之力,也能在文化与文化、人类与生态景观的隔离墙上撞开一个缺口,透进一丝希望之光。

山难带来了绝望,却也带来一个普通人扭转命运的故事。确切地讲,小林尽了人事,但推动这无人之作的天命,还来自那座城地的山神,他会无情地埋葬登山者的肉体,但最终解救了他们的灵魂。

(摘自《梅里雪山:寻找十七位友人》序言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新书秀场



译林出版社
「加拿大杰里米·格里马尔迪 著
《别人家的孩子》」

珍妮弗·潘自小是一个聪明、勤奋、顺从的女儿,一个出色的学生,一个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她是钢琴老师眼中极有天分的琴童,冬奥会花样滑冰参赛者的实力人选,学校里全A成绩的保持者。十几岁的她从伪造第一张中学成绩单开始,一路炮制中学毕业证、大学录取通知、奖学金、课堂笔记、校园生活、大学毕业证……她用谎言织就了一段“美好人生”,并沉溺其中无法自拔。当谎言渐渐被戳穿,“理想国”开始一点一点坍塌,24岁的她冷血策划了一场弑亲谋杀,一幕家庭伦理的悲剧正在上演。



爱心树童书 | 南海出版公司
「[日]宫崎骏 著
《有书真好啊》」

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作品多以和平、自然、爱为主题,用温暖的方式讲述现实世界,鼓励人们怀抱希望生活。70岁之际,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,重读对其影响深远的儿童文学作品,从400多本书中慎重挑选出50本,一一写下推荐文,郑重地推荐给所有孩子和葆有童真的大人。“有趣”“读起来愉悦”是宫崎骏推荐书籍的标准。在宫崎骏看来,儿童文学带给人希望,“即便生活不顺,也能将其跨越,从头来过”。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杨潇 著
《重走: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

本书是关于一个写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。1938年,“湘黔滇旅行团”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;2018年,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1600公里的长路。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,不时要与大货车擦肩而过,但沿途山色、水光、鸟鸣、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、交织,乃至对话、共振,一个被忽视的“中国”缓缓浮现。



果麦文化 |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「[德]尤格·布莱克 著
《过度的医疗》」

德国记者尤格·布莱克常年关注过度医疗、药物过量等领域的问题,并针对医疗产业做了大量深度报道,所著的《疾病发明者》《无耻的药物》等书,均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关于药物过量的全国性辩论,引起大众广泛关注,并由此促进了人们对“滥用药物”“提升医疗品质”等问题的重视。在著作《过度的医疗》一书中尤格·布莱克指出,尽管现代医疗有很多好处,但是,在我们把健康交给现代医学的同时,保持对过度医疗的谨慎和客观的态度,会远比盲从更加有益。

让文艺回归我们的精神生活

□刘仲国

《洞穴与后窗》是翟业军的第三部个人学术专著,收录的19篇论文,都是他对近年来文学、电影、话剧、纪录片名家名作和当代文化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后的用心之作。

在这些文章中,作者延续了之前的学术基点:对人的现世生存的关注。他所看重的,不是本质意义上的、被“提纯”了的人,而是“不彻底”的人:“不彻底”是人类的悲哀,因为生命只能这样得过且过地挨下去,“如匪浣衣”;说到底又是有慈悲意的,因为我们不必始终锃明瓦亮,我们可以保守着我们的黑暗,不让外人涉足”(《七巧,还是繁漪?》)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,从来不是单纯的黑和白,很多人,在很多时刻,无论是思想还是生活本身,都无法以好坏、是非、对错来简单地二元论概括和判断。面对世界的具体和复杂,我们的内心常常百转千回,却又无能为力。

这种杂色的、变化的地带和过程,正是文艺作品的关注点,也是作为批评家的翟业军所着力之处。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,他始终在寻绎人物的精神成长性,因为只有生动蓬勃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,有意义的。毕竟,人生虽多不易,但是向上向善之心总是为大多数人所葆有。犬儒主义哲学(或所谓“佛系”)的逆来顺受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,更不应该是文艺作品的方向。文艺虽然“无用”,但毕竟还有“无用之用”,否则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?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又凭借什么得以绵延升华?给生活以暖意,予人生以善意,这是翟业军

的学术姿态。

“动起来”,让文艺重新回到我们的精神生活,是翟业军对改变中国文学一向以板滞、静穆为审美追求的呼吁。这不仅体现在他对艺术作品中人物精神世界的要求上,而且也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独特的批评风格。翟业军放弃了批评文章一贯的四平八稳和面面俱到,采用了一种新鲜活泼、灵动生辣的文风。传统的文艺批评还要求批评家隐藏起自己的在场,以第三人视角对作品和艺术家作出“客观”评判,以显示自己的权威性和指导者地位。但是,批评既然是一种评判,又怎么可能做到“客观”?文艺批评为什么一定要“无我”?既然真正的客观并不存在,那么,为何不回到自己?只有“我”是在场的,“我”对文本的解读才是真正的。真实的“我”与真实的“你”和“他”在文本中相遇、交锋、缠斗,火花四溅,缪斯女神才能显影,美美与共才会成为现实。于是,翟业军干脆直接采用了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批评方式。

看他的批评文章,感觉就像是两个充盈的生命在激烈地、峻急地、尖锐地对话、论辩,语词和情感的密度很大,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破解秘密的快感,一种畅快表达的冲动——这是在以真正的文艺的方式进入文艺,是力与力、美与美的碰撞与传递。传统的客观性隐匿了,批评家的上帝权威消失了,但是,艺术真正能打动人的力量,不就是在这种“高能”状态下被呈现、被领悟的吗?

文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,独创为美,耻与人同。在飞扬灵动的个人风格之外,我们还可以发现,在翟业军的文章中,很少引用别的论者的观点。即使有,也经常带有一种商榷的态度。进入



《洞穴与后窗:从文字到影像的旅行》
翟业军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文本内部,他只会调动起自己全部的知识储备精耕细作,爬梳钩稽,而无暇他顾。文本于他,既是“迷官”,自己一个人进得去也能出得来;又是“迷楼”,他喜欢驻留的欣喜,会心的愉悦,正如他本人在解读王安忆的《考工记》时所言。这是一种顿悟之美,也是苏格拉底式的快乐。文章中那些反复的诘问,不正是一种辩难,一种确信,一种释放吗?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,让翟业军的文章在各类出版物上极具辨识度。

在这个意义上,我理解了有的作家确实是“怕”他的,而有的自然是喜欢他的——因为他的懂得,他的犀利,让艺术家与批评家在共同的成长中,不只体会到了创造的快感,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、尖利的痛感。痛并快乐着,才是对艺术之美的真实享受。